

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及其本土的女性批评

都岚岚

内容提要： 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欧美女性主义文论与性别研究产生于自己的文化语境。本文首先对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文化前提、主要派别、理论特色及其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进行了介绍，然后侧重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重组和改造，尤其是法国女性书写理论在中国的变异，并且剖析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困境和出路。本文认为，旅行至中国的欧美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既经历了创造性的阐释，又遭到了文化过滤甚至是误读。例如，法国的女性书写理论进入中国后，其概念发生浮动，它在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中转变为私人化写作，随后在商业语境下被窄化成“身体写作”，甚至畸变为“下半身写作”。这种畸变已经与西苏和伊利格雷所倡导的以书写女性身体来颠覆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初衷相去甚远。当女性主义旅行至中国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本土实际的文化语境，以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

关键词：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 法国女性书写 私人化写作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thoughts, Euro-American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nd Gender Studies originate in their own cultural contexts. This essay first introduces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Feminism, the major schools of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Feminism and Gender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Feminism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n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me Western Feminist thoughts in China, particularly the variation of the French *écriture féminine*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s, giving a tentative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of the localization of Euro-American Feminism and Gender Studies. The essay holds that when travelling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s, Western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nd Gender Studies are not only creatively interpreted by Chinese scholars, but also undergo a filtering of cultural reception and even a misreading. For instance, in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the French *écriture féminine* has been localized as personalized writing and then in China's commercialized context the personalized writing has been perverted into the so-called "body writing", or even "pussy writing". This perversion is far more distant from Cixous and Irigaray's original purpose of advocating *écriture féminine*. When Western feminism and Gender Studies travel into China, we must take the actual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s into consideration so as to build up Chinese Feminism and Gender Stud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inese reality.

Key words: Feminism; Gender Studies; French *écriture féminine*; personalized writing

一、欧美女性主义文论、性别研究的文化前提与理论特色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男女两性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风俗、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状况，这些不平等或显性，或隐性，却是如此的普遍和触目惊心，以至于性别成为继时代、地域、种族、阶级等维度之后又一重要的分析范畴。女性主义是妇女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权等方面获得与男性平等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在欧美，它发端于18世纪末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则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欧美崛起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模式和理论话语，经过数年的发展，在1985年前后逐步让位于性别研究。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欧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性别研究的产生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前提，即经历了三次浪潮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它们为欧美女性主义文论和性别研究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1. 关注同一：第一次浪潮

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指发生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女性要求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的社会政治运动。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回应了女性被排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公共生活之外的状况，试图扩展社会契约，争取女性在公共空间的权利。其主要目标是在财产、法律及选举权等方面要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主宰第一次浪潮的主要思潮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它起源于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认识论。17、18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以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基石，发展关于自由、法治、科学、真理等宏大叙述，倡导普遍的人权。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追随自由主义的传统，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进行吸收与批判，并以男女之间的同一性为依据进行争取男女平等的政治诉求。

自由女性主义代表人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为妇女权利的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中否认女性在理性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认为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思想人是生而平等的，那么女性也应享有天赋的权利。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可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同一是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重要依据。在对待男女两性同与异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更加强调男女之间的相同之处，而非两性之间的差异，认为女性在理性、力量、抱负心等方面与男性没什么两样，因此他们反对针对女性的照顾性政策，主张建立一个在公平基础上的精英统治（meritocracy）的社会。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女性缺乏公平竞争和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是教育方面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两性在理性上的差异，因此他们提倡女性争取平

等受教育的权利,从而使女性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发挥自己的潜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这一观点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消除男女不平等的主要战略是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改善女性受教育的环境、争取同工同酬等。

显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它虽然主张男女两性在政治、教育和就业上的平等,但仍然坚持认为男女在社会上应有不同的角色,这种社会角色的区分与公私两大领域划分的观点十分接近。自由女性主义者并没有从根本上质疑自由主义哲学的理性/非理性、心智/身体、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性/女性等二元对立思维,相反,他们认为女性进入家庭生活并决定生儿育女是一种个人选择,而女性一旦自愿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就应为自己今后的生活负责。这种号召广大女性走进公共领域却并没有号召男性进入私人领域的做法导致后来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承受双重负担,也即她们既要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传统的相夫教子的角色,又要在公共领域中像男性一样打拼天下。另外,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Stanton)虽然认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但是她却忽视阶级与种族问题,甚至发表过“白种女人比前奴隶更有选举资格”这样的言论,因而遭到后期黑人女性主义者的批判。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为女性争取形式上的平等依然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为以后的女性主义者变革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铺平了道路。

2. 从同一到差异:第二次浪潮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新左派势力不断壮大,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也日益高涨,但是许多参与其中的女性发现,在这些运动中分配给她们的大多数是具有传统女性特质的工作,如打字、为男性领导人端茶送水等,这便使那些希望为这些组织做出实质性工作的女性对其内部存在的性别主义倾向十分不满,于是在欧洲及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的要求争取两性平等的社会、政治运动,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虽然发表较早,但是它对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波伏娃用大量事实证明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由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变成女人的。这种女性的社会建构论为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反抗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机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波伏娃把生育视为女性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因而表现出对女性身体的厌恶和仇恨,这一点则受到了批判。

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先锋人物当首推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她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一书批判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在“二

战”后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只想做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的现状，而当她们成了主妇，又苦于看不到前途而极度空虚和苦闷。弗里丹用丰富的历史资料说明，美国妇女争取自己在社会上、家庭中的地位有其优良传统，也取得过胜利。这一观点大大地鼓舞了当时陷入“无名的困扰”之中的女性去继承前辈的事业，继续为妇女解放而斗争。正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所评介的那样，该书点燃了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火炬，女性主义运动的熊熊烈火再度燃烧。到1966年，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在美国成立，弗里丹任主席，为推进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做出了贡献。

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一个主要口号是“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即政治权力既运作于社会层面，又作用于个人层面。即使是女性最私下的个人经验，也是由于拥有霸权地位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制度造成的。这一口号实际上是向传统的公众/私人领域的分界挑战，认为性骚扰、家庭暴力等原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经验属于政治的范畴，体现了男女之间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以及男性中心主义在意识形态、经济以及性等方面对女性的控制。因而女性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强烈批判将女性客体化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审美文化、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等现象，挑战生育、母亲职责、性与家庭劳动等领域中歧视和压迫女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于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不仅要求女性在公众领域的平等，而且开始关注女性在家庭等私人领域内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因此她们主张在女性中间展开“提高觉悟”的女性小组活动，批判使女性受到压迫的社会制度与结构。

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相继涌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等主要理论流派，出现了米歇尔·巴瑞特(Michele Barrett)、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chell)、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玛丽·德利(Mary Daly)等主要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不再相信将女性包括进公共领域就会给女性带来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她们关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其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批判男性权力在社会体制、机构、话语等层面对女性的性别主义和性别歧视，分析男性权力统治的原因及可能的行动策略。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源于作为宏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男女不平等是从阶级不平等派生出来的。经济状况是决定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因而改善女性的工作地位和经济状况是女性解放的必经之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一方面关注女性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命运，剖析女性被认为天生是照看者和家庭劳动力的观念如何影响其在工作领域的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借鉴马克思主义对家庭进行变革的观点，认为妇女的家庭劳动，如做

饭、照看孩子和丈夫等,都应被包括在社会生产领域内。女性在家庭领域中的生产活动不应被看作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因为在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者的再生产过程中,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是其他社会劳动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发现了被马克思所忽略的家庭事务劳动在整个社会劳动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用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策略来凸显女性生产劳动的社会价值。

然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仍将阶级作为妇女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受压迫的终极原因,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路线,也试图寻找女性受压迫的一统性原因。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将社会性别和阶级看作同等重要的强有力的压迫机制,关注女性在性和再生产领域受压迫的现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借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强调女性的生殖功能与生产功能同等重要,她们将被忽视的家庭妇女的劳动价值揭示出来,分析社会生产中的这种等级制,指明它是女性受压迫的关键。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一文中认为妇女受压迫机制可以被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1]只有改变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去理解,就不难看出,父权制只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个工具,而对资本和资本积累的分析则足以解释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地位,并不需要对父权制本身进行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出现了性别盲点,认为对妇女问题的审视会淡化阶级分析中“更为重要”的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关注的是资本的积累与公共空间的有偿劳动之间的关系,从而忽略了女性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作为再生产者的作用,没有对劳动的性别分工做出合理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性别不平等置于阶级范畴内进行分析,并不能探究妇女所受到的特殊压迫,也没有给理解父权制的压迫机制留下理论思考的空间。因此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便试图将父权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将妇女压迫问题仅仅归为私有制度,忽视了在性别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以往的女性主义理论则只把性别压迫归结为生理上的压迫,将女性的解放放在靠生物科技的进步来改变女性的生殖功能上。只有把私有制的阶级和男性统治的父权制结合起来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解释女性在参加社会公共劳动生产之后仍然受到歧视的现象。

[1]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1页。

基于上述认识，一些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试图建立一些关于女性受压迫原因的宏大叙事。例如，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盖尔·卢宾（Gayle Rubin）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女性屈从地位产生的根源，总结出一套性别制度说（Sex/Gender System）。卢宾认为作为社会性别身份形成基础的女性交换制度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她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始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时所建立的关系要比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关系更为重要。她参照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关于信物交换、乱伦禁忌的理论指出，社会的“性别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在以人类再生产为主的社会中，最重要的信物就是女人，最基本的社会流通就是交换女人，婚姻是交换女人的仪式和形式。”^[2]在卢宾看来，交换女人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而不是私有制，因此她极力主张对亲属关系发动一场政治革命，以重构性别制度。卢宾的观点将思考重心转移到性别制度，在肯定经济要素的同时提出了社会、文化等其他要素，突出女性所受的特殊压迫，促使女性主义者对父权制的压迫机制有了更多的反思。

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凯特·米勒特则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将父权制作为一个斗争的概念重新挖掘出来。父权（patriarchy）原意为父亲作为家长的社会结构，米勒特从意识形态、宗教、文学等方面对父权制做出具体分析，认为父权制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和最根本的权力概念，它比任何形式的阶级压迫与种族隔离等压迫形式都更为久远和牢固。男人按照天赋的权利对妇女进行剥削的根源在于这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有着意识形态、宗教、心理、经济、教育等众多方面的支撑。对于妇女跨越历史、文化而遭受普遍性压迫的境遇，米勒特也同样使用了一个跨越历史和文化语境的总体性术语来描述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的受压迫地位。她在书名中通过将性与政治相结合来凸显女性私下的生活也同样遭受父权制体制压迫的状况。米勒特在《性政治》中辩论道：“当说到性别时使用‘政治’一词是因为，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在，这个词在勾勒两性关系地位的真正特点时尤为有用。我们超越传统的正统政治提供的简单的概念框架，发展一种更为相关的心理与权力关系哲学，这在今天是适时的，更是必需的。实际上，比起我们所习惯的基础，我们基于并不那么传统的基础来关注界定关于权力关系的政治理论是十分迫切的。”^[3]米勒特通过将性与政治相连，说明人类的性活动并不是单纯的生物行为，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的权力关系网之中，即性是具有政治寓意的范畴，是男性话语权力的体现。

性政治是西方文学和父权制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古至今，两性关系就是男人支配女人的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处于宰制地位的男权群体根据自身的需要规定男尊女卑的性别

[2] 转引自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6页。

[3]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London: Virago, 1977, p. 24.

定式,使性别分工促成男女地位的差别。女性不仅受到个体男性的压迫,而且社会制度也倾向于压迫女性,因而米勒特坚决批判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提倡进行推翻父权制的彻底革命,终结父权制的统治和压迫。米勒特的观点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很有代表性,她将政治这一概念引入人们最为熟悉的亲密关系上来,成为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流行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一个有力佐证。

受米勒特启发,激进女性主义者反对私人领域中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强奸、色情等现象,主张彻底推翻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父权制社会制度。也就是说,激进女性主义不把重点放在政治上的压迫或争取男女同工同酬之上,而是注重文化与意识形态、家庭伦理及繁殖后代过程中的文化与社会机制如何通过再现体制的渗透将女性纳入文化体制,使她们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甘愿承担子嗣的繁衍并且恪尽母职。因此,激进女性主义主张以提升女性意识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达到对文化与社会体制更深层的解构。但是,由于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宰制妇女的男性权力无所不在,很多激进女性主义者走向了一种极端,她们将所有的男人当作敌人,拒绝承认有男性女性主义者的存在。在对待同一与差异的问题上,她们承认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而且她们认为女性天生优于男性,正是独特的女性气质为女性的生命增添了光彩。这样一来,激进女性主义逐渐走向倡导独特女性价值的文化女性主义。这种将所有男人看作敌人的做法使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因拥护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而遭到质疑,而简单逆转男/女二元对立结构的文化女性主义也遭到后来的女性主义思潮的批判。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关于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认识都建立在一些有关妇女的宏大叙述的基础上,在女性的社会建构如女性的社会角色、家庭、母爱等方面的认识上具有一统性和普遍主义的倾向,认为压迫妇女的根源是一元的、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及父权制造成的。这种一统性的理论框架由于无法代表处于不同种族、阶级、年龄的女性经验而受到黑人女性主义者的批判。这使女性主义理论逐渐从关注同一过渡到关注差异的认识上来。

3. 包容差异、解构固化身份：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M·杰奎·亚历山大(M. Jacqui Alexander)、丽莎·阿尔布里希特(Lisa Albrecht)和迈布·西格瑞斯特(Mab Segrest)编著的《第三次浪潮:思考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视角》(*The Third Wav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Racism*)一书,但是在这本书的语境中,第三次浪潮是用来反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的种族主义倾向,挑战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为首的领袖排斥有色人种妇女,以一己经验衡量所有女性经验的做法。1992年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女士》(*Ms.*)杂志上发表题为《成为第三次浪潮》的文章之后,这一术语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并用来指由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之后出生的女性宣扬的女性主义。莱斯丽·黑伍德（Leslie Heywood）和詹妮弗·朱瑞克（Jennifer Drake）认为第三次浪潮既指年轻的女性主义者这一代，也指有别于第二次浪潮的新形式的行动主义，即广泛应用大众文化和网络空间传达女性主义意识的行动策略。可见第三次浪潮这一术语在使用上经历了变化，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虽然第三次浪潮主要指由 X 一代^[4]倡导的女性主义，但是第三次浪潮绝不仅仅限于年轻女性，它还可以指在全球资本主义、信息技术、后学思潮等不断发展的新时期里女性主义形成的新的意识形态立场。针对早期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忽视妇女内部差异的倾向，第三次浪潮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思潮为理论武器，反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帝国主义情绪，主张对女性内部的差异持更加包容的态度。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者拥护多样性与多元性，拒绝将女性身份单一化和本质化。她们驻足于地方性的女性经验，考察流动的、充满矛盾的女性身份，例如，有些青年女性主义者可能一面浓妆艳抹，一面对美容业存在的厌女倾向和种族主义持批判态度。对于身处易性、双性、跨越种族等不同身份的青年一代而言，她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可能就是种族主义者和性别主义者，她们对待那些亲人的态度是矛盾的、模棱两可的，很难清楚地划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正如黑伍德在《第三次浪潮的纲领：当女性主义者，做女性主义》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知道压迫我们的东西可能并不压迫你们，压迫你的东西可能正是我所参与的事情，或者压迫我的东西正是你所参与的事情。”^[5]可以说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者正是这种矛盾和差异的产物，因而必须发展多元思维的模式来应对多元文化身份中面临的流动的压迫机制。

其次，与第二次浪潮不同的是，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的行动主义观念和策略发生了改变：它不再以集体的妇女运动形式为主，不再寻求解决女性问题的一统性办法和代表性组织，而是主张在地方性的空间解决小范围内具有相同经历的女性的问题。她们延续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斗争，继续将文化生产和性政治作为斗争的主要场所，重新肯定传统的女性特质，将女性的愉悦作为个人赋权于自己的一种形式。除了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压迫的愤怒之外，她们还用欲望与愉悦来点燃对正义的企盼。这对于第二次浪潮而言可能并不具有足够的行动主义意味，但是赋权于个人是第三次浪潮行动主义的独特形式，而得到权力的标准是个人的愉悦，网络空间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阵地。

第三次浪潮的行动主义策略发生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者已不

[4] X 一代（Generation X）主要指 1961 年到 1981 年出生的人，以区别于“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baby boomers）。“第三次浪潮”这一术语意指由年轻女性倡导的女性主义。

[5] Leslie Heywood and Jennifer Drake, *Third Wave Agenda: Being Feminist, Doing Femi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3.

再相信启蒙主义的宏大叙述,不再相信跨越历史语境的父权制对所有妇女造成一统性的、共同的压迫。相反,第三次浪潮更倾向于认为多种压迫形式作用于具体语境中的妇女。也就是说,由于妇女在种族、阶级、宗教、年龄、性倾向等方面的差异,“父权制”“压迫”等字眼已不像从前具有一统的、含义稳定的内涵,它们的含义是具体的、多元的、不确定的。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者接受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的理论,认为由于权力结构是局部的、毛细状的,抵抗也是分散的、动态的、区域性的,因而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结盟,进行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

再次,由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行动主义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信息技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及环境恶化等的反应,因此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者不只关注“女性问题”,还对与女性问题密切相关的诸如环境保护、人权、反公司运动等极为关注。反思与第二次浪潮的关系、关注消费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对年轻女性的影响、聚焦具有多元轴心的女性身份、突破单一的性别问题而关注与性别问题交叉的所有形式的压迫是美国当代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主要议题。琳达·阿尔科夫(Linda Alcoff)和E.波特(E. Potter)认为:“如果女性主义要想解放妇女,它就必须设法解决几乎所有的宰制形式,因为女性分布于每一种压迫范畴的不同等级中。……每一位妇女生活在压迫网络中的不同节点之上。因此,将一种解放工程称为‘女性主义的’并不意味着它只关系到‘妇女’,它只是更受女性主义影响或与其相一致。按照当前女性主义者的说法,它致力于废除各种压迫网络,重新编织生活之网。”^[6]民族、种族、阶级、性倾向、身体状况、年龄等因素都可能造成女性主义观点上的差异,而且由于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出现了流派众多、思想异彩纷呈的局面。青年女性主义、有色人种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酷儿理论、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后工业时代女性的社会现状以及寻求争取两性平等的可能途径。

4. 欧美女性主义文论的主要派别与学术贡献

基于波澜壮阔的妇女解放运动和丰富的妇女文学传统,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欧美女性主义文论大致分为英、美、法三家学派。女性主义学者埃莲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曾言:“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是精神分析学的,它强调压抑;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文本分析式的,它强调表达。然而,它们都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7]由于其深厚的左派传统,英国女性主义文论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影

[6] Linda Alcoff and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4.

[7] Elaine Showalter,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Critical Inquiry*, Vol. 8, No.2 (1981), pp. 179-205.

响很深，对文化研究颇感兴趣，因此英国女性主义学者主张将种族问题、阶级问题和文化问题都纳入女性主义研究的范畴，从而分析具体语境中的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和解决途径。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茱莉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露西·伊利格雷 (Luce Irigaray) 和埃莱娜·西苏 (Helene Cixous) 主要受到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和语言学的影响，更加注重女性写作理论方面的建构。受当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启发，法国女性主义者主张对历史文化的载体即语言进行拆解。她们深入话语层面，揭露父权制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运作规则，并试图建立符合女性欲望的女性语言和书写理论。

法国女性书写 (écriture féminine) 理论的代表作之一是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法文原文发表于 1975 年，英文发表于 1976 年 *Signs* 第 4 期)。该文认为，父权制文化创造了单一的理性逻辑，这种理性逻辑压抑了女性欲望，使得女性身体在父权制文化中没有得到真实的再现。在对父权制思想中的二元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中，西苏发现，奠基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生活的二元对立结构隐含压迫女性的论断，它们使女性同自己的身体发生异化，将女性欲望导向女巫般蛊惑的妖术。因此要想从无休止的等级式的二元对立体系中突围，就必须改写整个体系，用新的关系拆解和取代以贬低女性为前提的非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西苏认为，在父权制的象征秩序中，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女性一直处于象征秩序中的他者地位。父权制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对女性的钳制与对其身体欲望的压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身体被压制的同时，言论和书写的自由也被压抑。女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回归女性自身的身体和心理体验，真正拥有自己的身体，因此她号召女性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西苏从女性写作的本源是身体这一立场出发，倡导女性书写应以多元的女性身体欲望这一独特的女性经验为中介进行创作，以达到对抗非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本目的。

为彻底颠覆二元对立的理性逻辑，反对非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压抑，西苏倡导女性运用感性、诗性的语言言说身体的欲望。在创作传统上，西苏提倡用白色乳汁书写，即从滋养生命、抗拒分离、维系女性纽带的母性品质，从母亲的馈赠中汲取灵感；在创作类型上，她认为诗歌最适合女性写作，这不仅由于诗歌通过潜意识获取力量，而且由于潜意识这个无限的异域空间正是被压迫的女性得以生存的地方。西苏本人在阐述女性书写理论时，就采用了非常诗意的语言，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双关、文字游戏等，以不同于男性话语的方式写作。西苏的女性书写富有诗意、具有高度的隐喻性、明确地反理论，是一种反对西方父权文化的理性逻辑、具有女性文本特质的书写风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西苏所提倡的女性书写是“文本的特质，而非作者的性别”。^[8] 她在列举法

[8] 刘岩，《女性书写》，《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第92页。

国文学中女性书写的典范时,既提到了像科莱特(Colette)、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这样的女作家,也谈及让·热奈(Jean Genet)这样的男作家,说明了男作家也可以创作出富有诗意的女性书写。

对西苏而言,写作是改变女性命运,进入历史的唯一途径,因此她把写作同女性身体相联系,主张女性应从女性力比多汲取营养,用身体表达经验和思想。通过回归身体、感受身体、书写自己的身体,女性可以创造出蕴意丰富的语言,以多元的意义摧毁社会等级和性别隔阂。可以看出,在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中,用诗意的语言抒写女性的身体是反理性和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手段,是用女性的身体形成的不同于男性逻辑的“飞翔的姿态”。

另一位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伊利格雷也对父权制语言和各再现系统无法再现女人的欲望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伊利格雷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再现系统中,女人是被男人排斥的他者,无法得到真实的再现,也不会被赋予主体的地位。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1974)中,伊利格雷指出,西方形而上学用“同一性”逻辑去诠释女人和世界。父权制依靠内化的男性形象确立社会关系,根据男性的自我定义去反观女人,把女人建构成男人的他者和对立面。由于依照男人的标准而存在,女人只能映照男人,从而丧失了主体性,沦为父权制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的镜像。德里达曾用“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来说明精神分析话语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具有同态性(isomorphism)。伊利格雷也认为,支撑精神分析话语的正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类似的假定:精神分析学将菲勒斯作为先验的能指,正如西方形而上学以理性和神言作为超验的能指。伊利格雷批判精神分析学的鼻祖弗洛伊德依据单一的男性模式阐释女性特质的做法,认为弗洛伊德根据男性凸显的性器而将女性定义为缺乏是以同一性或男性主体的认同为基础的。女性被定义为缺乏,是被阉割的男人,其女性特质只能补充男性发展,满足男人的需要,女性因而沦为男人的欲望客体。这种同一性逻辑无法为自身意义上的女人留下生存的空间。

整个西方哲学话语呈现出与男性性征的某种同态性,以至于女性的再现很成问题,因此探究与女性身体和快感同态的新型话语就很必要。伊利格雷一方面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女人说”(le parler-femme),希望能通过构想女性语言重塑女性的主体性,但是伊利格雷拒绝用描述性的语言去定义“女人说”这种新型话语。她明确表示,“女人说”不主张单一的意义,不偏爱规范的主谓句法和推理的逻辑结构,不采取等级制组织,因为女人的快感不服从于单个器官,不能遵照同一性原则去界定。再现女性性征的新型话语应具有多样性、流动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伊利格雷曾言:“我从一种普适性的现实开始,即性别差异……这种为二的现实总是一直存

在，但是它被呈现为一的强制性逻辑……因此我的做法是用来自现实的一部分的普适性来替代遵循总体性现实的普适性……这促使我重建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社会，以便能够同时更真实、更公正、更普适地达成一种文明。”^[9]“女人说”的特点是没有中心，难以用理性的逻辑分辨连贯的意义。重复含混、歧义丛生、意义多元、充满隐喻是“女人说”的文体特征。

从根本上讲，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所倡导的女性书写旨在解构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钳制，从表述女性身体的性欢愉（jouissance）的层面对男性话语进行突围，并为构建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做出努力。这种诗意的女性书写的核心是创立一种摆脱父权制文化影响的空间。

美国女性主义文论较为注重对文本的批评实践，它将文本解读与对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批判相结合，并关注女性读者对文本的创造性阅读。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揭露潜藏在男作家作品中的性别歧视思想，对男作家笔下刻板的女性形象进行质疑，督促女性读者对这类女性人物进行“抗拒性的阅读”，积极抵制男性偏见。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就是这类批评的典范之作。1976年朱迪斯·弗莱厄（Judith Fryer）的《夏娃的面孔：19世纪美国小说中的妇女》（*The Faces of Eve: Women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Novel*）概括了美国经典小说中“狐媚的妖女”“美国公主”“强悍的母亲”和“新女性”四种妇女形象，呈现了父权制意识形态下被类型化的女性形象，丰富了米勒特所开创的研究方法。同时，美国女性主义学者主张挖掘被忽视或遗忘的优秀女作家，试图以此复兴女性文学的传统，建设和发展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例如，埃莱娜·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1977）、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与苏珊·格芭（Susan Gubar）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和19世纪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magination*, 1979）分别对特定女作家作品的题材、主题、结构、意象、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确立了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gynocriticism）的方向。

虽然英、法、美三派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各有侧重点，但总体而言，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包括对男作家创作的重新阐释与评价；对女作家创作的挖掘、评论与总结；女性美学体系的探索；女性写作理论的建构等。

性别研究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重估现有的学术传统，探究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得以形成的文化因素，因此性别研究不仅仅关注妇女的权益、地位等问题，它还关注包括男性

[9] Luce Irigaray, *Why Different? A Culture of Two Subjects: Interviews with Luce Irigaray*, Sylvère Lotringer ed., Camille Collins trans., New York: Semiotext(e), 2000, pp.146-147.

在内的性别问题,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转向性欲研究和性别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福柯关注的是某些被言说而成为知识,某些被排斥而成为异端的条件。他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从各个方面对现代的控制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福柯认为性欲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性欲的历史就是关于主体的历史,其意义和内容随着历史时期发生变化。不同时期和国家对同性恋的态度与该时期那个国家的话语建构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同性恋的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希腊社会男子间的同性欲望是在政治秩序中代表自己的一种方式,因而并未受到压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同性恋则被视作疾病,遭到强制性的治疗。福柯发现,19世纪维多利亚的道德社会对性的压抑不仅没能控制性,反而催生和激励了性的发展。为此福柯认为,权力不仅具有压迫性,而且具有生产性。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结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话语是维护权力的语言表现的诸系统,是支持权力结构的公认的思维模式。它不仅是语言,而且是文化和社会机构的工具。话语使权力关系具体化,权力在话语中产生,并由话语来传递。没有也不可能有超验的思维,理性和真理只是话语的结果。可见话语、权力、知识之间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使女性主义学者得以将微观的语言研究和宏观的历史文化研究合为一体。福柯有关权力是局部的、自下而上的观点使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对现代女性的压制不仅来源于父亲和丈夫的直接控制,而且女性自己也会将男性的控制内在化,用父权社会对女性气质的规范来规训自己的身体及社会身份。根据福柯的理论,女性主义运动若按照启蒙主义的“革命理论”来寻求作为整体的女性解放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当代权力结构和话语的特点,探索妇女在各个散落的权力网络中如何发挥主体意识,从而发展联合其他妇女来改变妇女现状的斗争理论和策略。在具体的权力关系内定位女性经验是后结构女性主义进行批评实践的前提。

1985年伊芙·塞吉维克(Eve Sedgwick)的代表作《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被公认为性/性别研究领域具原创性和突破性的作品,标志着性别研究开始成为热点。在《男人之间》的引言中,塞吉维克指出该书旨在“探寻塑造性的方式,探寻哪些东西可以算作性,而这两方面都依赖于并影响了历史上的权力关系”。^[10]在该书中,塞吉维克提出一个区别于“男同性恋”的重要概念,即“男性同性社会欲望”,认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同性

[10] Eve Kosofsky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7.

社会欲望”指男性个体之间的社会纽带，它与“男同性恋”这一概念相分离，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而“女性同性社会欲望”与“女同性恋”之间存在连续性，两者经常被认为是同一回事。塞吉维克从社会、经济及权力关系的角度，通过对一些英国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分析形成上述不对称现象的原因，认为男女同性社会欲望的历史差异是持续的男女权力关系不平等的表现。塞吉维克指出，异性恋这一传统结构与同性恋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传统异性恋的结构是以女性作为交易媒介的男子之间互惠的关系，恐同是以异性恋霸权为规范的父权制度的必然结果，或者说，父权从结构上要求恐同情绪存在。因此不应将恐同情绪仅仅视为是对同性恋的压迫，而要意识到恐同情绪是控制整个性别系统的工具。她认为，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恐同都不是任意的或无缘无故的，而是紧密交织于家庭、性别、年龄、阶级以及种族构成的轴线中。如果不改变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我们社会中的恐同情绪就不会停止。塞吉维克的《男人之间》以性为主要议题，弥补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传统女性主义理论中欠缺关于性的讨论的现象。她将性这一分析范畴放到了一个显著的、质询的位置，试图对女性主义研究做出反恐同的贡献。

美国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0年的代表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是性别研究的必读书目。秉承福柯，《性别麻烦》使用福柯的系谱学方法，追踪了主体身份出现的条件。在该书中，巴特勒分析了性别化的身份得以形成的规训权力，提出了著名的性别述行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主体的问题及其形成不是先于伦理与政治问题的本体条件；政治与社会条件、社会规范管制促成了主体的形成。性别身份不是客观的，它的形成是反复征引社会规范的行为的结果。没有这些行为，就不会有相应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是一种建构，因而可以改变的。巴特勒的述行理论否认先在的性别本体，拒绝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进行区分，认为生理性别一开始就已经是社会性别，两者都在话语的框架内形成。这一观点将生理性别从自然化的表象中解放出来，为寻求颠覆和置换那些支持男性霸权的自然化的性别概念提供了可能性。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具有文化建构性的观点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性别的范畴具有重要意义。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结构女性主义将性别界定为社会与话语的建构，挑战性别差异的自然观，质疑女性是一统的、普适的范畴，这一理论视角对考察性别在建构过程中呈现的权力关系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方法。

从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欧美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统一体，它虽然以争取男女平等为宗旨，却没有固定的模式，它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理论。女性主义在批判中诞生，在探索中前进。

二、译介与研究：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在中国

翻译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是中国女性思索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事实证明，中国的确从西方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那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西方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理论著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代表作的翻译和介绍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的范例，促进了本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下面就对中国学术界所做的译介工作进行简要介绍。

1. 1981—1985年：初期引介

1981年《世界文学》杂志第4期发表了朱虹的文章《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是中国学术界最早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文章。该文认为，美国“妇女文学”的繁荣是女权运动的结果，因而她对西方女权运动源起、特征和影响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强调了妇女文学与女性主义思潮之间的深刻联系。1983年朱虹编选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凯特·肖班的《一小时的故事》、夏洛特·吉尔曼的《黄色墙纸》、蒂利·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等展现女性意识的经典的美国女作家创作的短篇故事。朱虹为引进和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美国妇女文学打响了第一炮。

1984年由王逢振等人翻译的《美国当代文学》(丹尼尔·霍夫曼主编)面世。该书下卷有一篇题为《妇女文学》的文章，由伊丽莎白·詹威(Elizabeth Janeway)撰写，郑启吟翻译，该文详细介绍了“二战”以来美国当代妇女文学的成果与特色。作者不仅评价了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米勒特的《性政治》、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等女性主义经典书目，还对妇女文学出现的新的创作倾向，如作品的自传性因素、对神话、童话的改写与戏仿、隐喻的使用、少数族裔女作家的兴起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国内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引介尚属初级阶段，仅有少数关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妇女文学的学者为中国学术界作了相关介绍，这一阶段未能与中国的文学发展形成直接关联。

2. 1986—1995年：走向鼎盛

从1986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动态，并思考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文学实践的影响和借鉴作用。1986年1月17日邓伟志在《中国妇女报》上发表了题为《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的文章，表达了中国学术界希望将妇女问题提升到学术层面的愿望。同年，张萍翻译了日本作者富士谷笃子的《女性学入

门》，女性学^[11]作为一门学科开始被国人所了解。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走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桑竹影、南珊翻译的波伏娃的《第二性》的出版。译者仅翻译了原著可读性较强的第2卷，而在第1卷中，波伏娃主要从哲学、生物学、经济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剖析了女性为何沦为第二性的原因，由于其哲理性较强，译者并没有翻译第1卷。第1卷后来由晓宜、张亚莉翻译，以《女性的秘密》为书名于1988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1986年的译本虽只翻译了原著的第2卷，但却让国内读者部分地了解到波伏娃对性别差异所进行的“现象学式的描述”。波伏娃用女性为受害者的现象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偶然性。她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说明，社会性别作为身份的一方面是逐渐获得的。女人的生成总是受到文化规范、禁忌、习俗和法律等的影响。这一观点让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是女性”(being a female)和“是女人”(being a woman)的不同，即“女性”指的是固定的、自然的身体事实，而“女人”指的是这些身体事实被赋予文化内涵的各种模式。1998年《第二性》的全译本(陶铁柱译)出版。^[12]经由多个版本的译本，国人得以了解《第二性》这一经典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著作。

此后，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理论著作得到更多的译介和介绍。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两个译本。同年，由周宪等人合译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录了埃莱娜·肖瓦尔特发表于1979年的著名论文《走向女性主义诗学》^[13]。1989年朱虹与文美惠主编了《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收录了625位女作家的条目，为引进西方女性主义和妇女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中译本出版(王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胡敏等人翻译了英国学者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一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林建法、赵拓翻译了陶丽·莫伊(Toril Moi)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一书。上述译作都对国内学术界进行女性主义的

[11] 1998年北京大學設立了女性學研究生專業方向。1999年至2000年河南大學和南開大學文學院相繼獲得女性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2006年中華女子學院設立女性學本科專業。同年，北京大學的女性學研究生專業方向升級為碩士學位授予點。2008年廈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設立女性學研究碩士點，2012年升級為女性學博士授予點。可見女性學的本科、碩士、博士的學位教育已被納入中國高等教育體系。詳見魏國英，《女性學研究的方法與方法論問題》，《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第1-6頁。

[12] 自1986年《第二性》節譯本出版以來，《第二性》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次數已達近十次。除了由陶鐵柱翻譯的全譯本被再版兩次外，其他的譯本都是選譯或節譯。值得關注的是，2011年鄭克魯翻譯的《第二性》面世，此全譯本將《第二性》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3] Elaine Showalter, "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 in Mary Jacobus ed., *Women Writing and Writing about Women*, New York: Barnes, 1979, pp. 22-41.

研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在译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发表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型论文,大量关于女作家、女性写作的研究论文占据了学术刊物的众多版面。从1988年开始,《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学术刊物上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专栏。不少杂志都刊载了关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例如,1986年学者李小江在《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发表了《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一文、王逢振在《外国文学动态》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1987年朱虹在《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简·爱〉与妇女意识》;1988年韩敏中在《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发表了《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康正果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等。可见,当时国内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是随着译介工作的进展同步进行的。

编著和专著方面,1988年,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而最值得一提的专著首推1989年出版的由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该书借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学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等,以作家论的形式深入阐释了卢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9位中国现代女作家,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勾勒出中国女性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史上开创性的地位。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该论文集收录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重要文章,影响颇大。此后,徐坤的《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写作》、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著作陆续出版,标志着本土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走向成熟。

1995年9月4日至15日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女性文化的发展和女性文学的研究过程。此次会议以后,中国进一步把实现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全面推进中国性别平等的进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得到长足发展。杨莉馨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6个特点:“(1)美英学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法是中国学者接受的主流,但法国学派的影响也开始出现。(2)随着中西文学交流的深入发展,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一门显学。(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果更为丰富和多样化。(4)性别研究的主体不仅仅是女性学者,男性学者的参与度也在增加。(5)以女性文化和文学为题材的丛书日益丰富,一些高校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6)女性主义诗学开始进入中国学者撰写的文论史中。”^[14]世妇会使中国获得了与世界各国进一步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中国从此再掀译介

[14] 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113页。

高潮，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开始向纵深发展。

3. 1996 年至今：纵深发展

世妇会以后从 1996 年开始，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得到加速传播。在这个阶段大量有关西方社会性别理论的著述，如《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15]《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6]《不同的声音》^[17]《女太监》^[18]《性经验史》^[19]《女性主义思潮导论》^[20]《酷儿理论》^[21]《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22]《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23]《消解性别》^[24]等均被翻译、引入中国。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放弃一味地用西方观点和术语阐释本土性别问题和文学实践的做法，对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从而使中国的女性主义进入理性反思和兼容并蓄的纵深发展阶段。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文坛对“女性文学”的内涵进行了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什么是女性文学产生了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仅按照作家性别分类，认为只要是女性写的就是女性文学。第二种看法是按照性别加题材的分类，认为女性文学是女作家所写的表现女性生活的文学。第三种意见认为女性文学是女作家所写的体现女性意识的文学。第四种意见则认为男作家所写的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也可算作女性文学。针对于此，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如崔卫平、刘思谦、王侃等对如何理解、界定和使用“女性文学”“女性写作”等术语进行了反思。实际上，并非女作家写的就是女性文学，因为有些女作家的创作未必以女性的生活、情感与经验为创作重心。而且她们当中有些人或多或少受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浸染，会将自己或女性人物客体化和他者化。^[25]性别加题材的分类虽然兼顾了创作主

[15] 原著为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John Stuart Mill,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王蕤、汪溪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16] 原著为 Juliet Mitchell,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李银河译, 北京: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17] 原著为 Carol 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肖巍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

[18] 原著为 Germaine Greer, *The Female Eunuch*, 欧阳昱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19] 原著为 Micha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余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20] 原著为 Rosemarie Tong, *Feminist Thought: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艾晓明等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21] 原著为 Gayle Rubin et al., *Queer Theory*, 李银河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年。

[22] 原著为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宋素凤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

[23] 原著为 Judith 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张生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24] 原著为 Judith Butler, *Undoing Gender*, 郭劭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

[25] 例如卫慧、棉棉的《上海宝贝》《糖》这样的作品主动迎合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趣味，以丧失主体人格为代价，就是自己把自己“他者化”的作品。

体和创作对象,但是所谓的女性生活与男性生活基本上是无法分割计算的。而“女性”这个概念本身的歧义性造成了“女性意识”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女性意识”是作为生物性的女性的意识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意识呢?而且,不谈男作家是否真的能超越男性视角而真实再现独特的女性经验,若认为男作家所写的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也算作女性文学,那么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就更显得大而无当了。对此,刘思谦认为,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应具有历史性和现代性内涵,其概念的核心是女性主体性,是女作家对独特隐秘的女性经验和女性价值的体认。言说主体和经验主体的女性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应是衡量女性文学的标准。因此刘思谦对女性文学的界定是:“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26]女性主体意识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过程,它并不是一切生而为女性的人与生俱来的意识。女性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说便是讲述在历史变迁中的女性如何从依附性的“他者”转变为具有独立主体性意识的人的过程。因此作为以女性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女性文学批评,就必须把女性主体性作为阐释文本意义的价值尺度。从1989年女性文学的研究著作《浮出历史的地表》开始,该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著作,这些著作普遍将性别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和立场,质疑和批判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男权中心意识,归纳和总结不同的性别立场在文学主题、文体风格等方面的规律。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致相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方面致力于以性别视角观照文学领域,为性别研究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另一方面也开始摸索女性文学的独特内涵。

其次,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对“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术语进行了辨析。2007年穆乃堂撰文《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研究》,对“个人化写作”进行了反思和总结。该文认为,“个人化写作”虽得名于陈染在《花城》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个人化写作”的论文,但是它并不仅仅指涉及女性个人经验的女作家的创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男作家和女作家都试图同主流意识形态相疏离,以个人化的写作立场解构权威的、集体的、主流的宏大叙事,彰显男性和女性的个人生存状况在历史中的遮蔽,因而对情感的、个体的、边缘的关注成为许多男作家和女作家共同的写作特征。可见,对个人隐秘经验的书写并非女作家专有,像韩东、朱文等男作家也可被列入个人化写作的名下。罗振亚、王光明、王家新等评论家认为,诗人的个人化写作不应与90年代某些女作家的私人化写作相混淆。诗人的个人化写作是诗人从个体立场出发介入文化语境、处理时代生存问题的一种话语姿态。它不承担任何群体的义务和职责,仅以呈现个人经验和个人想象力为创作目的。

私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文学现象,一般以

[26] 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4页。

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性作家为代表。2008年陶东风对“私人化写作”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关于“私人化”的界定必须以“公众化”为对照。“私人化”不是一种艺术风格，它不仅指人的体验方式或写作方式，同时也指人的经验类型或写作内容。“私人化写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小说叙述的经验内容上说，私人化写作表达的不是公共经验或群体意识，而是私人经验、私人意识（以及无意识），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伦理法则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经验，如同性恋、弑父或恋父情结、恋母情结、自恋情结等等所谓的“异常经验”“阴暗心理”。二、从写作方式上说，私人化写作大多采用了“新回忆录”或“新传记式”叙述。无论是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还是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都是以女主人公的经历为叙述的基本框架。三、从作者角色上说，私人化写作的作者是一个小写的“我”（私人），而不是大写的“我”（群体、人民或公众代言人），他（她）只是私人经验的表达者与私人欲望的倾诉者，不是大众的生活导师、启蒙领袖、灵魂工程师，也不是社会黑暗的暴露者与批判者。四、从写作动机上说，私人化写作的驱动力是个人心理需要，尤其是无意识与隐秘欲望，与群体无关的私人经验的表达冲动与倾诉欲望。^[27]

在中国文学界，某些作家表现出与宏大叙事和主流话语相疏离的姿态，他们将身体作为存在和感知的基础。林白在访谈中曾言：“对我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28]从林白的话可以看出她的个人化写作与陶东风所总结的私人化写作有些相似之处，这也是中国文坛出现个人化写作、私人写作甚至是身体写作等术语混用的现象。对此穆乃堂认为：

当学术界试图为“个人化写作”进行科学的定义时，却又因对创作现象的过度追踪而导致其概念的单向化，其时“女性创作”在由陈染、林白等向卫慧、棉棉等位移时，市场操作使欲望取代身体，纵欲成为身体解放的主要趋势，以前对“个人化写作”所设定的个人感受、价值立场、叙事方式等几个支点，在卫慧、棉棉等人的颓废写作的对照下轰然溃败，“个人化写作”也因对欲望的过度宽容而自掘陷阱，沦入“非写作”的尴尬，这种对“个人化写作”的探讨已走入困境。^[29]

[27] 详见陶东风，《“私人化写作”重识》，《福建论坛》，2008年第9期，第92页。

[28] 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林白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29] 穆乃堂，《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研究》，《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第69页。

以上论述说明,中国女性主义学者不再满足简单的译介和术语的照搬,而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现状、未来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进入了纵深发展的时期。

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女性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因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说,性别问题与地域、历史、文化、种族、阶级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空中,其形态和内涵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性别问题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差异性,不能将诞生于欧美文化语境中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中国来。如何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使其有效地解决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性别问题,如何有效地将欧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成果本土化是当前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领域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

1. 重组与改造: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本土化

如前所述,欧美女性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文学文化研究界涌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女学者,如朱虹、韩敏中、戴锦华、荒林、艾晓明等;另一方面,王逢振、王宁、孟繁华、叶舒宪等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男性学者也时常声援女性主义研究,以其特有的男性身份对男性话语权力进行无情的消解,促进了女性主义的深度发展。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引进、吸收、扬弃、重组和改造的过程。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有自己的文化前提。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自发、自觉地为自身争取权益不同,中国妇女运动的首倡者多是具有启蒙思想的男性。而且自晚清以来,在康有为、梁启超、林纾、秋瑾等有识之士的视野中,性别问题一直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他们所主张的兴女学、放小脚等女性解放运动与“强种保国”密切相关,因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从一开始便与由男性精英主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相关。女性解放思想也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达草根阶层。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伦理观念影响的中国女性未能获得普遍的觉醒,中国妇女并不像西方语境中的激进女性那样与男性形成对抗的力量;相反,在中国,女性更多的是以与国家、民族利益为先,并与男性群体协商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因此,如果说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建构在激进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基础上,并对其进行回应,那么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却是一种致力于中国女性思想启蒙的方法与途径,因为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女性的思想也远未达到深刻体悟女性主体意识的层次。中国因此迫切需要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的译介，在对中国读者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也完成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创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妇女翻身做主人，享有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毛泽东提出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号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演变成女性极力淡化其女性特征，并向男性中心的社会尺度自觉认同的倾向。“铁姑娘”成为广大妇女的行为典范。长期累积下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维方式抹杀了两性之间的差异，将女性的一些特点，如女性爱美、温柔、细腻等特征，视为资产阶级意识的体现。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更是对两性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进行了粗暴的干预，婚姻生活、情感生活遭到忽视和异化。相当长的时间里，广大中国女性竭力掩藏爱美的天性，被迫处于一种男性化的生存状态。“文革”后改革开放以来，延续毛泽东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中国现代女性积极投入社会生产中，在职场和家庭生活方面往往面临双重压力。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开始对“文革”期间充斥宏大叙事话语和极端崇尚集体意志的状况进行反拨，创作注重个人的经验世界和欲望的作品逐渐增多。张洁、张辛欣、谯容等女作家在对抹杀性别差异、压抑情感生活的时代进行揭露的同时，呼吁承认性别差异，弘扬女性文化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追求男女平等的目标下，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两性关系的新认知。有些学者进而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双性和谐”的理念，倡导与男性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例如，1995 年中国学者万莲子在《掇拾“双性和谐”的文化意义》一文中明确反对西方的“双性同体”概念，认为“双性同体”概念的主旨在于抹除性别差异，而中国文化更讲究天下万物阴阳和合，强调和谐共生，因此她提出了更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双性和谐”的理念。这便是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观念在中国发生变化的有力佐证之一。^[30]

此外，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的“空白之页”概念也在中国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苏珊·格芭在《“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一文中探讨了女性的自主与创造问题，认为女性身体所提供的最基本的、也最能够引起共鸣的隐喻就是血。^[31]在格芭看来，新娘床单上的空白是被剥夺了发声和书写权利的女性群体拒绝被父权意识形态所污染的历史文化文本，它通过自己独特的形式形成了艺术创造的一个隐喻，是一种对父权制贞洁观的边缘化的抵制与自我言说。“空白”是对纯洁的拒绝，因而是一种神秘而又富有潜能的抵抗行为。而在中国学者王绯这里，“空白之页”成了女性在历史和文化中缺席的空白地位的悲剧性写照。^[32]女性在文学史上历史性的“空白”有待于具有女性主体性意

[30] 参见万莲子，《掇拾“双性和谐”的文化意义》，《文学自由谈》，1995 年第 4 期，第 119 页。

[31] Susan Gubar, “‘The Blank Page’ and the Issues of Female Creativity,” *Critical Inquiry*, Vol. 8, No. 2 (1981), pp. 243-263.

[32] 参见杨莉，《异性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2-143 页。

识的女作家的积极填补。可见,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发生了创造性的阐释。当理论从西方旅行到中国,它必然会发生变异,但是应如何变异却是每一位比较文学研究学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2. 文化过滤与误读:法国女性书写理论在中国的变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域外文论在中国发生最显而易见的流变之一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倡导的女性书写理论。法国的女性书写理论进入中国后,其概念发生浮动,它在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中转变为私人化写作,随后在商业语境下被窄化成“身体写作”,甚至畸变为“下半身写作”。这种畸变已经与西苏和伊利格雷所倡导的以书写女性身体来颠覆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初衷相去甚远。对私人化写作的拙劣模仿已成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问题浮出地表的症候。

所谓私人化写作,主要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女作家退守私人空间,以描述女性个体的身体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创作潮流。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相继以自传体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女性的身体欲望和心灵成长的故事。陈染以独白式的短句搭建起一个自足封闭的私人空间,用回忆倾诉式的叙事结构讲述了女性的身体欲望和心灵体验。她的小说没有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观照,没有对历史和社会的宏大叙事,而是转向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描述了孤独的女性在封闭幽暗的房内展示身体、倾听自我的状态。此外,她的写作具有明显的反男权色彩,她的小说中父亲经常是退场或缺席的,体现出明显的恋父或弑父情结。

林白的小说则用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立场展现女性的身体美。例如,林白借《致命的飞翔》中的女主人公李莪之口宣称:“我将以一个女人的目光(我的摄影机也将是一部女性的机器)对着另一个优美而完美的女性,从我手上出现的人体照片一定去尽了男性的欲望,从而散发出来自女性的真正的美。”^[33]陈染、林白的身体叙事不仅是女性欲望的真实告白,而且对于女性的性体验,陈染和林白的笔触是唯美的、非写实的。林白《致命的飞翔》就以隐喻的手法描写了女性的身体及欲望:“她感到男人到达了她的上方,她张开她的身体等待得救,她摊开两条胳膊,像一只鸟儿,即将随着一股气流飞上蓝天。”^[34]

可以看出,陈染和林白都以书写女性身体和欲望为己任,她们的创作态度有着鲜明的法国女性书写理论的烙印。陈染自己曾在网上宣称:“只有我的身体是我的语言”。^[35]这与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说的“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回到自己的身体”^[36]具

[33] 林白,《林白作品自选集·守望空心岁月》,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137-138页。

[34] 林白,《红艳见闻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35] 陈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http://202.102.234.206/fanyt/nxwx/ran/chenr02.htm。

[36] 转引自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有明显的一致性。而林白的女性人物对镜中影像的偏爱也与西苏的镜子隐喻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于女性的身体欲望，自古以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是禁言、讳莫如深的。女性或被固定在唯美、纯洁的位置上被膜拜，或被描述为放荡的红颜祸水加以批判。真实的女性欲望总是被封闭和压抑，成为维护男性秩序最坚固的堡垒。对此西苏曾言：“身体被幽禁、被妥善保存着，完整如初地珍藏于她自己的镜中。”^[37] 林白在《致命的飞翔》中则说道：“有一些女人就要从镜子里出来了，她们最英勇最活泼，因此最美丽，她们的身体触碰到镜子冰冷的表面，我听见发出了滋滋的声音，这种声音灼伤着她们的皮肤，灼痛着她们的眼睛，但我们最后听到乒的一声，镜子在空中舞蹈着，破碎在地上。”^[38] 林白延续西苏关于镜子的隐喻，将敢于言说自己身体愉悦的女性描绘为破镜而出，她们尽管可能会遍体鳞伤，但却在用身体讲述女性的真实。这是一种抗拒性的叙事姿态，林白用身体的愉悦去对抗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从创作实践上履行了法国女性书写的主张。因此徐坤的《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一书在论述“女性私语与个性化写作”时认为，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是“一部完全按照女性主义理论操作的精致女性文本”，“引导和贯穿作品始终的，正是埃莲娜·西苏提出的那种女性书写逻辑：女性躯体的写作—手淫—自慰—自恋—飞翔—文本引起破坏性—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自己”。^[39] 徐坤认为，林白以准自传的记录形式从写作实践的意义完成了对法国女性书写理论的认同。

然而，如果认为私人化写作是法国女性书写理论在中国的全盘移植则是失偏颇的。私人化写作不是对法国书写理论亦步亦趋的模仿，它的出现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这就是说，西苏这种女性以她们的身体为媒介消解男性话语，建立女性独有的话语体系的尝试与中国女作家的私人化写作之间有暗合之处，但也有差异之处。暗合之处在于两者都以女性的身体为叙事对象，差异之处则在于私人化写作的诞生有自己的文化语境。对私人经验的表达和再现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中国正值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正经历着转型的年代，个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告别宏大叙事，躲避崇高，将身体作为存在和感知的基础，与主流话语相疏离。她们的私人化写作旨在用女性的个人经验释放被宏大叙事压抑的个人叙事。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她们看来，公共的人是被压抑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她们坚持在主流文学之外的边缘位置上书写真实的个人体验，使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对此林白在访谈中曾言：“对我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

[37] 同上，第191页。

[38] 林白，《红艳见闻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39] 徐坤，《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写作》，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40]法国女性主义倡导的身体写作旨在解构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钳制,从身体的层面对男性话语进行突围,为构建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做出努力。而林白、陈染、徐小斌的私人化写作旨在用女性的个人经验释放被宏大叙事压抑的个人叙事。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她们看来,公共的人是被压抑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她们坚持在主流文学之外的边缘位置上书写真实的个人体验,使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

然而,由于过于强调它们表面上看上去十分相似的女性身体叙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将两者联系起来,并简单地认为法国的女性书写就是身体写作,全然不顾身体写作的隐喻性质。有些人甚至认为女性书写就是女作家以书写身体为目标,于是私人写作又被冠以“身体写作”“躯体写作”,甚至是“下半身写作”。这尤其是因为私人化写作在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后内涵也发生了窄化。它更多地被导向中国语境中个人化的欲望书写。女性书写变成了单纯书写肉体的欲望,身体不是中介,而是目的,已完全没有了西苏女性书写理论中对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初衷。法国女性书写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下经历了文化过滤的现象,甚至遭到了误读。

在陈染、林白的私人化写作之后,中国文坛出现了对私人化写作的拙劣模仿。如果说陈染和林白的小说对女性隐私心理、女性欲望、性体验的描写仍是唯美的、诗意的,那么“下半身写作”的写手们对女性欲望的书写则是赤裸裸的描述。她们展览女性隐私,以求商业卖点。在这个价值缺席、意义退场的时代,关于女性欲望的话语已然失控。

从卫慧、棉棉这批“美女作家”到九丹的“妓女文学”,从春树的《北京娃娃》的残酷青春宣言到“木子美现象”和竹影青瞳“图文并茂”的大胆出位,这些写手以上海、北京和广东为主要根据地,与市场合谋,借助媒体炒作,极尽描写构成男人欲望对象的年轻、貌美、性感的身体,将身体叙事等同于写身体,将其简化为对欲望和性本能的写作。在她们的文本中,女性人物拒斥情爱欢愉所具有的精神维度,将身体行为偷换为性事活动,身体自由偷换为性事自由,极大满足了消费者的窥私欲望,也鼓胀起文化商人的腰包,为男性欲望话语的狂欢提供了平台。这些写手对私人化写作的拙劣模仿其实是用身体写作的名义掩盖一种实质上的色情文学,因而危害极大。戴锦华认为,女性书写理论在中国发生畸变是因为:

[40] 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林白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一边是急剧推进的现代化、商业化进程，它不仅事实上不断恶化着女性的生存环境，而且使经商业包装而翻新的传统女性规范再度涌流；另一边，男性写作不断丰富着某种阴险莫测、歇斯底里、欲壑难填的女性形象，把其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停泊地，用以有效地移植自身所承受的创伤体验与社会性焦虑。与此同时，商业化进程所造成的主流社会及话语的裂解与多元化，在制造着挤压女性的社会力量的同时，也造就着新的裂隙、诱惑与可能。^[41]

在商业主义泛滥、人文价值失落、功利思想盛行的社会风气下，部分女性写手出于迅速成名和获取商业利润的动机进行自我推销，进而迎合某些消费者的窥私欲望。可以说这些写手所进行的“躯体写作”或“下半身写作”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了当代中国物欲横流、利益为先的社会问题。

从法国女性主义的女性书写理论到陈染、林白等人的私人化写作，再到色情文学写手的“下半身”写作，我们看到理论旅行有时不仅会产生积极意义上的重组和改造，也会产生消极意义上的畸变，因此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和阻止文学与消费主义、商业投机同流合污的可能，为改善中国的文化环境做出不懈的努力。

3. 困境与出路

西方女性主义如何与中国语境融合对接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是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界的思考重心之一，因为一味地简单照搬欧美女性主义的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并不一定完全适合阐释中国语境中的性别问题。例如，美国的多元族裔社会催生了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相交叉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中国虽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但各民族和谐发展的国情使得种族与性别的关系并不像美国那么尖锐和突出。在传统文化势力非常强大的中国，对多元性爱倾向的包容远没有西方社会那样强大，这就决定了同性恋研究、酷儿理论等思潮只能停留在学术圈层面。在中国的语境更突出的反而是性别和阶层的交叉问题，如农民工阶层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因此当西方女性主义的各种思潮传入中国时，我们不应在未弄清其产生的语境和含义的情况下盲目照搬其理论的表面符号，也不能让译本的误读构成话语迷雾，不知所云。因此，必须在深入理解原著的基础上提高译本质量，在不同的平台实现中西方的交流与对话，从而搞清某种思潮的背景和含义，思考其借鉴意义。

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中较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文本阐释常常预先设定女性必然遭受男性压迫的处境，这一前提较容易强化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状态，批评的火药味浓烈，这使得在男女两性并不像西方那样处于对立状态的中国文

[41] 转引自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

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读者感觉女性主义的面目可憎,不受待见。中国社会“与男共舞”^[42]的传统注定了中国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在理论基点上的差异。因此要防止出现这种批评观念先行、方法单一的倾向,避免简单化、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给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所带来的障碍,笔者认为具体的解决途径是:观照中国的文化语境,同时将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与其他理论话语结盟。因为女性的身份在这个多元、变化的世界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资源均可以整合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当中,以分析具体情境中的特定女性。这就是说,性别不是唯一的分析范畴,必要时性别视角可以与阶级、地缘政治等维度相结合,综合考虑性别问题中的权力关系。另外,转向性别研究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于同时关注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性别,其学术视野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扩展。女性文学研究转向性别研究是因为女性问题离不开男性问题的参照,也离不开其他维度和性别问题的交叉。

其次,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更多青睐主题、人物等内容方面的研究,而有意无意漠视叙事、语言等形式方面的探索,这造成某些信息大量重复,缺乏批评的新意和应有的学术尊重。当文学史领域中的性别研究更多只是落在思想内容层面上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沦为一种远离文学自身特性的自外而内的研究,并与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的性别研究趋于雷同,失去研究的独特价值,产生存在合法性的危机。因此必须充分重视作品内部的复杂因素,关注文本本身的文学性。

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无法完全超越各自所生成的经济、社会体系。西方女性主义是在欧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西方国情的产物,有浓厚的本土性。但是,由于妇女的特定地位在父权制社会的不同社会结构中具有相似之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西方女性主义是具有文化批评内涵的理论,当它旅行至中国的语境中,必须考虑到中国本土实际的文化语境,同时将性别研究放在一种更为开放的格局中,以建构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是作者参与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批准号:12&ZD166]的阶段性成果)

[42] 王绯,《女性批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第24页。